

大家小书

鲁迅批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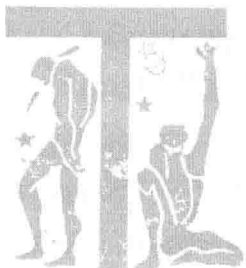
李长之 著

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出版社



鲁迅批判
李长之 著

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鲁迅批判 / 李长之著. — 北京 : 北京出版社,

2017. 10

(大家小书)

ISBN 978-7-200-12276-3

I. ①鲁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鲁迅研究②鲁迅著作研究 IV. ①K825.6②I210.9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160170号

总策划: 安 东 高立志 责任编辑: 秦 裕

· 大家小书 ·

鲁迅批判

LU XUN PIPAN

李长之 著

*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
北京出版社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: 100120)
网 址: www.bph.com.cn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
新华书店经销
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*

880毫米×1230毫米 32开本 8.25印张 133千字

2017年10月第1版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200-12276-3

定价: 39.8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由本社负责调换
质量监督电话: 010-58572393

大家小书

序 言

袁行霈

“大家小书”，是一个很俏皮的名称。此所谓“大家”，包括两方面的含义：一、书的作者是大家；二、书是写给大家看的，是大家的读物。所谓“小书”者，只是就其篇幅而言，篇幅显得小一些罢了。若论学术性则不但不轻，有些倒是相当重。其实，篇幅大小也是相对的，一部书十万字，在今天的印刷条件下，似乎算小书，若在老子、孔子的时代，又何尝就小呢？

编辑这套丛书，有一个用意就是节省读者的时间，让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较多的知识。在信息爆炸的时代，人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。补习，遂成为经常的需要。如果不善于补习，东抓一把，西抓一把，今天补这，明天补那，效果未必很好。如果把读书当成吃补药，还会失去读书时应有的那份从容和快乐。这套丛书每本的篇幅都小，读者即使细细地阅读慢慢

地体味，也花不了多少时间，可以充分享受读书的乐趣。如果把它们当成补药来吃也行，剂量小，吃起来方便，消化起来也容易。

我们还有一个用意，就是想做一点文化积累的工作。把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的、读者认同的著作，搜集到一起印刷出版，使之不至于泯没。有些书曾经畅销一时，但现在已经不容易得到；有些书当时或许没有引起很多人注意，但时间证明它们价值不菲。这两类书都需要挖掘出来，让它们重现光芒。科技类的图书偏重实用，一过时就不会有太多读者了，除了研究科技史的人还要用到之外。人文科学则不然，有许多书是常读常新的。然而，这套丛书也不都是旧书的重版，我们也想请一些著名的学者新写一些学术性和普及性兼备的小书，以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需求。

“大家小书”的开本不大，读者可以揣进衣兜里，随时随地掏出来读上几页。在路边等人的时候，在排队买戏票的时候，在车上、在公园里，都可以读。这样的读者多了，会为社会增添一些文化的色彩和学习的气氛，岂不是一件好事吗？

“大家小书”出版在即，出版社同志命我撰序说明原委。既然这套丛书标示书之小，序言当然也应短小为宜。该说的都说了，就此搁笔吧。

李长之《鲁迅批判》再版题记

于天池 李 书

李长之的《鲁迅批判》是一部不足十万字的小册子，但在鲁迅研究史上却是赫赫有名的传世之作。

它是鲁迅研究史上第一部成体系的专著，是唯一经过鲁迅披阅的批评鲁迅的专著，也是迄今在研究鲁迅的学术领域中引文率最高的专著。

与作者坎坷的人生经历一样，《鲁迅批判》也经历了艰辛屈辱。在国民党统治大陆的岁月，它被视为“左”派读物予以排斥；在日伪统治时期，它被列为禁书查封；新中国成立伊始，它被人深文周纳地暗示为“某一时间，某一地区，某一部分人”的观点。1957年之后，随着作者被划为右派，它更成为黑书被封存于图书馆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一工宣队队员指着李长之的鼻子说：“是你写的《鲁迅批判》吗？鲁迅是可以批判的吗？就冲着‘批判’，你就罪该万死！”随着改革开放和

文艺界春天的到来，《鲁迅批判》渐次抹去尘封，恢复了它在学术界应有的地位，而作者李长之却早已在1978年作古。

老实说，《鲁迅批判》并不是李长之的成熟作品，甚至不是很成功的作品。就李长之的批评著作而言，它不如《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》沉潜成熟，体大思精；就对于鲁迅的认识评论而言，它也不如作者后来写的《文学史家的鲁迅》等作品凝练深刻，学识渊深。对于《鲁迅批判》，李长之自己也不甚满意，早在《鲁迅批判》1943年发行第三版时，他就表示要“另写一部鲁迅再批判”（《鲁迅批判》“三版题记”，1943年，东方书社）。1950年李长之在《鲁迅批判的自我批判》一文中，又一次表示“对于本书，愿意重写”的愿望。站在21世纪的今天，回首观照《鲁迅批判》，它不如人意的地方的确不少，它毕竟是李长之25岁尚未从清华大学毕业时的作品：资料的采集、理论和学识的积累、观点的推敲、文意的表述，都有可以进一步完善的余地，而且，根据《鲁迅批判》的后记，称它为急就章似乎也不太为过。

但为什么在作者不甚满意，在大半个世纪的鲁迅研究史上饱受磨难的情况下，《鲁迅批判》依然拥有广大的读者呢？

这不能不归之于《鲁迅批判》一书特有的魅力和特有的价值。具体说来，它有不可替代、不可抹杀、卓然独立的三个

方面。

所谓不可替代，是《鲁迅批判》表达的是亲历五四运动的文学青年对于鲁迅的感受。

李长之生于1910年，比鲁迅小29岁，五四运动爆发时他刚刚9岁。按照常理，在小学读书的他本不应该有什么深切的感受，可是他是一个早熟的文学少年。加上他的班主任王世栋热心提倡新文化运动，此时期他对于胡适、陈独秀、鲁迅已不陌生。他也很早就开始阅读鲁迅的作品，他读《呐喊》是在1923年，13岁，刚上中学。“当时青年受鲁迅的影响实在深，”李长之回忆说，“我记得，有位姓郭的朋友，因为读鲁迅的文章，而感到社会的不满太多了，曾主张过要提倡‘怒的文学’，终至于在一个期间作了精神病患者。还有位姓沈的朋友，性子是和平些的，但对社会也仿佛感慨甚深，一遇见事情，每每有他锐利的冷然的观察，这结果就使各处对他也不满起来了，他赚下的，乃是‘苦闷’和‘牢骚’。根源呢，是因为他常读鲁迅的杂感。这都是中学毕业前后的事，大家不过是十六七岁的孩子。”李长之当然“也是其中的一个”。他说：“我受影响顶大的，古人是孟轲，我爱他浓烈的情感，高亢爽朗的精神；欧洲人是歌德，我羡慕他丰盛的生命力；现代人便是鲁迅了，我敬的，是他的对人对事之不妥协。不知不

觉，就把他们的意见，变作了自己的意见了。”“不但思想，就是文字，有时也有意无意间有着鲁迅的影子”（《鲁迅批判》“后记”，1935年北新书局出版）。李长之是在新文化运动导引下踏上文学道路的，私淑的导师之一就是鲁迅。他对于新文化运动，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巨匠鲁迅之认识自是具有特殊的感受。

在《鲁迅批判》中，李长之固然是站在批评家的立场上来评论鲁迅的，但更确切地说，他是站在“养育于‘五四’以来新文化教育中的青年”的立场上对鲁迅进行评论的。他有其独特的视角、倾注的重心、激扬的文采，他把鲁迅纳入新文化运动中去审视，尤重鲁迅之于青年的期望和青年对于鲁迅的崇敬。他一则说：“生存这观念，使他的精神永远反抗着，使他对于青年永远同情着，又过分的原宥着，这也就是他换得青年的爱戴的根由。在生活上，我们有时麻木，或者妥协，拯救了我们的，就是鲁迅的那枝笔。”“科学的精神，却永远没离开他过，而且那辐射着的光芒，也无时不从他的小说，尤其是他的杂感里，而到达读他的作品的是他所鼓舞着的青年人的心。”再则说：“因为鲁迅在情感上的病态，使青年人以为社会、文化、国家过于坏，这当然是坏的，然而使青年锐敏，从而对社会、世事、人情，格外关切起来，这是他的贡献。因为

鲁迅在理智上的健康，使青年人能够反抗，能够前进，能够不妥协，这是好的。同时，一偏的，不深于思索的习惯之养成，却不能不说是坏的。”“他在战士方面，是成了一个国民性的监督人，青年人的益友，新文化运动的保护者了，这是我们每一思念及我们的时代，所不能忘却的！”他对于鲁迅，对于新文化运动爱得深，故也看得真切、透辟，并有着青年人判断特有的冲击力。他评价鲁迅创作的意义是：“从此，新文化运动便有了最猛勇的战士，最妥实的保护人，中国国民也有了最严厉的监督，青年则有了不妥协，不退缩的榜样，而新文艺开了初期的最光彩的花。这重要不止在鲁迅，而且在中国！”那是他真切的感受，并道出了鲁迅价值的真谛。

我们常讲文学批评是有时代性的，“文变染乎世情，兴废系乎时序”；同时我们说批评也是有阶层意识的，就是说不同教养、年龄、文化背景下的人对于同一事物的批评会千差万别。李长之的《鲁迅批判》所提供的不仅是同时代人对鲁迅的批评，更重要的是提供了“养育于‘五四’以来新文化教育中的青年”的批评，它新鲜、锐敏、富于朝气。

鲁迅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伟人，是永恒的；但他又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巨匠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，在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下，读者的解读和观照会因时空的推移而有所进展或迁

移。从这个意义上，在鲁迅批评史的长河中，代表着鲁迅同时代的，“养育于‘五四’以来新文化教育中的青年”的批评所具有的真实和切近，就具有不可替代性。

所谓不可抹杀，是指《鲁迅批判》受德国文艺理论影响，采用精神分析方法辨析鲁迅之思想性格，并由精神人格进而解读其作品的评论体系。

相对于当时大多数人采用的社会学批评方法而言——这也是整个20世纪以来鲁迅学研究的主流方法，李长之在《鲁迅批判》中采用的精神分析方法，无疑具有新颖性、叛逆性。研究方法与文化观念是相联系的。如果说，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，可以容忍精神医生的诊断无避忌的话，那么，对于评论家之于人的精神人格无顾忌的解剖，容忍度就有限得多。因为中国社会太习惯于用忠奸善恶这类社会学字眼去进行评判，太习惯于笼统模糊，太习惯于绝对，太习惯于舆论一律，尤其是当对象是社会名流的时候就更是如此，更难以容忍用病理生理式的剖析去对待。

在精神分析的导引下，李长之认为鲁迅在情感上是病态的，在灵魂的深处“粗疏、枯燥、荒凉、黑暗、脆弱、多疑、善怒”，尽管这“无碍于他是一个永久的诗人和一个时代的战士”（《鲁迅批判》五 总结：诗人和战士的鲁迅——鲁迅之

本质及其批评)。

他解释鲁迅善于写农村题材而不善于写城市题材的原因说：“他那性格上的坚韧，固执，多疑，文笔的凝练，老辣，简峭都似乎不宜于写都市。写农村，恰恰发挥了他那常觉得受奚落的哀感，寂寞和荒凉，不特会感染了他自己，也感染了所有的读者。同时，他自己的倔强，高傲，在愚蠢、卑怯的农民性之对照中，也无疑给人们以兴奋与鼓舞。都市生活却不同了，它是动乱的，脆弱的，方面极多，局面极大，然而松，匆促，不相连属，像使一个乡下人之眼花缭乱似的，使一个惯于写农民的灵魂的作家，也几乎不能措手。”（《鲁迅批判》四 鲁迅之杂感文）为什么鲁迅不能写长篇小说呢？他认为原因之一是“写小说得客观些，得各样的社会打进去，又非取一个冷然的观照的态度不行。长于写小说的人，往往在社会上是十分活动，十分适应，十分圆通的人，虽然他内心里须仍有一种倔强的哀感在。鲁迅不然，用我们用过的说法，他对于人生，是太迫切，太贴近了，他没有那么从容，他一不耐，就愤然而去了，或者躲起来，这都不便利于一个人写小说。宴会就加以拒绝，群集里就坐不久，这尤其不是小说家的风度”（《鲁迅批判》五 总结：诗人和战士的鲁迅——鲁迅之本质及其批评）。而鲁迅杂感之多，他认为则有精神方面的原

因：“在当代的文人中，恐怕再没有鲁迅那样留心各种报纸的吧，这是从他的杂感中可以看出的，倘若我们想到这是不能在实生活里体验，因而不得不采取的一种补偿时，就可见是多么自然的事了！”（《鲁迅批判》五 总结：诗人和战士的鲁迅——鲁迅之本质及其批评）

他尤其善于把鲁迅的精神人格和作品中的人物进行比较，深入开掘，使鲁迅的人格精神和作品中的人物互相辉映阐发。他评《阿Q正传》时说：“鲁迅那种冷冷的，漠不关心的，从容的笔，却是传达了他那最热烈，最愤慨，最激昂，而同情心到了极点的感情。阿Q已不是鲁迅所诅咒的人物了，阿Q反而是鲁迅最关切，最不放心，最为所焦灼，总之，是爱着的人物。别人给阿Q以奚落，别人给阿Q以荒凉，别人给阿Q以精神上的刺痛和创伤，可是鲁迅是抚爱着他的，虽然远远地。别人可以给阿Q以弃逐，可是鲁迅是要阿Q逃在自己的怀里的。阿Q自己也莫明其妙，荒凉而且悲哀，可是鲁迅是为他找着了安慰，找着了归宿；阿Q的聪明、才智、意志、情感、人格……是被压迫得一无所有了，有为之过问、关怀，而可怜见的么？没有的，除了鲁迅。阿Q还不安分，也有他生活上糊涂的幻想，有人了解，而且垂听，又加以斟酌的么？也没有的，除了鲁迅。”（《鲁迅批判》三 鲁迅

作品之艺术的考察)他评《伤逝》则说:“无疑地,这篇托名为涓生的手记,就是作者的自己,因为,那个性,是明确的鲁迅的个性故。他一种多疑、孤傲、倔强和深文周纳的本色,表现于字里行间。在书中,涓生和子君刚刚同居,子君是‘和她的叔子,早经闹开,至于使他气愤到不再认她做侄女’了,而涓生,却也记道:‘我也陆续和几个自以为忠告,其实是替我胆怯,或者竟是嫉妒的朋友绝了交’(《彷徨》页一八五),看这末清楚,而至于刻画的地步,这是鲁迅!一种常感到奚落,讽刺的压迫,也是鲁迅所特有的,在文中记叙常到通俗图书馆的情形道:‘好在我到那里去也并非为看书。另外时常还有几个人,多则十余人,都是单薄衣裳,正如我,各人看各人的书,作为取暖的口实。这于我尤为合适。道路上容易遇见熟人,得到轻蔑的一瞥,但此地却决无那样的横祸,因为他们是永远围在别的铁炉旁,或者靠在自家的白炉边的’(页一九七)。特别不能忘怀于别人的轻蔑,这是鲁迅!后来涓生愿意和子君别去,因为子君在生活上并不奋斗了,只给涓生以失望和痛苦,这时涓生又记道:‘我和她闲谈,故意地引起我们的往事,提到文艺,于是涉及外国的文人,文人的作品:《诺拉》,《海的女人》。称扬诺拉的果决……也还是去年在会馆的破屋里讲过的那些话,但现在已经变成空虚,从

我的嘴传入自己的耳中，时时疑心有一个隐形的坏孩子，在背后恶意地刻毒地学舌’（页二〇一），在失望的忧虑中，有一种倔强之态，这是鲁迅！多末真切的一篇记录。”（《鲁迅批判》三 鲁迅作品之艺术的考察）

这些分析，在长于或习惯于用社会学批评鲁迅的研究学界不啻有些旁门左道，特别是那些有碍于鲁迅伟人形象的字眼更是刺人眼目。

不能说李长之的精神分析方法是评论鲁迅最为高明的方法，也不能说他运用得就一无瑕疵，像他认为鲁迅初期的小说“抒情的成分很大，似乎是当时由于他的寂寞之感作用他吧”（《鲁迅批判》二 鲁迅之生活及其精神进展上的几个阶段）就显然失之于简率。然而，你不能不承认这种研究方法打破了传统研究方法的板结，是有益的尝试，而且，那意义不仅仅是对于鲁迅的研究。

所谓卓然独立，是指《鲁迅批判》不因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巨匠而虚美，也不因热爱鲁迅而饰非，本着求真的目的，是其所是，非其所非，保有着批评家可贵的风骨。

李长之在文艺批评上非常讲究批评精神，他说：“文艺批评最要紧的是批评精神。”“批评是反奴性的。凡是屈服于权威，屈服于时代，屈服于欲望（例如虚荣和金钱），屈服于舆

论，屈服于传说，屈服于多数，屈服于偏见成见（不论是得自他人，或自己创造），这都是奴性，这都是反批评的。千篇一律的文章，应景的文章，其中决不能有批评精神。批评是从理性来的，理性高于一切，所以真正批评家，大都无所顾忌，无所屈服，理性之是者是之，理性之非者非之。”“批评需要分析，不但好坏分明，就是好之中的坏，坏之中的好，也要分明……严羽说‘吾论诗若哪吒太子，析骨还父，析肉还母’，这是批评家的真精神。”（《批评精神》，南方印书馆1942年出版）

李长之在《鲁迅批判》中也是这么做的：“尽力之所能，写出我一点自信的负责的观察，像科学上的研究似的，报告一个求真的结果而已。”“因为求真，我在任何时都没有顾忌，说好是真说好，说坏是真说坏。”（《鲁迅批判》“三版题记”）

他评论鲁迅的作品，特别单列了一节指出“鲁迅在文艺创作上的失败之作”。明确指出哪些是好的，为什么好；哪些是不成功的，为什么不成功。既不是全盘肯定，也不是全盘否定。

他认为在《呐喊》和《彷徨》中，《孔乙己》、《风波》、《故乡》、《阿Q正传》、《社戏》、《祝福》、《伤